

关中农村研究

第二辑

执行主编 郭占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中农村研究

第二辑

主 编 付少平

执行主编 郭占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中农村研究. 第二辑 / 付少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61-9539-0

I. ①关… II. ①付… III. ①农村—社会管理—研究—陕西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31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马 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54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定向委托专项“西部农村社会转型与乡村治理观测及支撑平台建设”资助。

序一 打造农村社会研究关中学派的 抱负应该肯定^{*}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 5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美丽校园里，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探讨。重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心议题，因为青年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的希望。在这里，我要感谢青年学者的踊跃参与；也要特别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领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我们基金会一起主办这次“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

上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刚刚举办了建校 80 周年暨合校 15 周年的庆祝活动。80 年的风雨，80 年的沧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985”、“211”序列的农业院校，服务“三农”发展，也应该成为学校各文科院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人文学院刚刚改名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校还将农村社会发展确定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方向之一，说明学校非常重视中国农村研究，重视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已经组织中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通过中心编辑的小册子，可以看到，学院里的这批青年人非常活跃，短短三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批年轻人希望能够在学校、学院的扶持下，打造农村社

^{*} 2014 年 9 月 20—21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本文是郑杭生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以此文代序，衷心感谢郑先生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学人的肯定和鼓励。

会研究的关中学派，抱负很高，热情也高，还很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学会今年7月召开的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就做了《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我在致辞中指出，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虽然起点不算高，但是中心的老师们从一开始就有心想做成一个学派，确实不容易，应该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

围绕这个问题，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讲三点意思。

首先，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什么样的学派。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关中地区的历史名人，关学创始人，也是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横渠先生——张载。早在北宋时期，他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之道，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一个什么样的学派，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从中汲取理论资源。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中，经济快速发展，总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更在加速转型，这是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民族的崛起，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学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央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然而，中国学术要有话语权，就需要不断深化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出我们的声音，营造学术生长的空间。照搬西方的理论是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必须要靠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又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在扎根中国改革经验、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

其次，如何来做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我想提一些我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重要的农村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目前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依托的农村经验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比如华北农村、东北农村、华南农村、长江三角洲、湖北中部地区等，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就为西北地区的农村研究创造了学术生长的广阔空间。

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前一直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是传统中国小农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因此，扎根田野，立足关中，面向西北地区，定能做出一批有影响力、有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学院提出创建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很有希望，也很有远见。

去年7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2013年贵阳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题为“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的致辞。这里的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有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出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中国学派。

今年我在《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中，对什么是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进一步拓展，归纳为“三再、两气、一追求”。“三再”，就是前面讲到的“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两气”就是“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从学术的角度讲，接地气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接现实中国的地气、接历史中国的地气、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所谓“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社会学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这里的“真”指的是科学性，“善”和“美”指的是人文性。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追求真善美，提升精气神。事实表明，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

可以这样说，今后中国社会学界的良性学术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这方面基本功的功力如何，能否在掌握有关事实资料的基础上，既高屋建瓴，又具体分析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既能揭示世界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发展趋势，又能展现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中国经验。通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通过接现实中国、历史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通过把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结合，正确处理中西、古今、理实这三种基本关系，鉴别各种思潮，从而推动中国学派的建设，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并为中国社会的良性运

行、协调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今年在陕西遴选了10个县30个村作为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长期的固定观测点，听说将来还要在其他省市建立类似的观测点。只要能够长期坚持，立足关中这片土地，有理论自觉的精神，练好基本功，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情况。基金会成立三年来，先后资助了34个博士生项目、30个硕士生项目，还资助了90位青年学者。其中，青年学者项目，去年就有你们学院的赵晓峰博士，今年又有你们学院的陈辉博士。青年学者项目，连续三年，每年都有110位至120位青年学者递交论文，我们每年从中选出30篇，应该讲这些论文的质量都还是很不错的，三次论坛都非常成功。

另外，我们还创办了两个刊物《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现在《社会学评论》已经出了十期，上了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已经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C刊。《社会建设》也在2014年3月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今年出创刊号和第二期。《社会建设》所涉范围很广，现阶段以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为重点。这两个刊物是我们社会学界共同的、持久的平台，这两份杂志的一个宗旨也是为青年社会学者搭建一个茁壮成长的学术平台，大家有合适的稿子也可以投给我们。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这两个学术刊物，一定能够办成高质量的学术刊物。

预祝这次论坛开得成功，大家都有收获。

谢谢各位！

郑杭生

序二 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关中，是陕西中部关中平原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关中地名的历史典籍，经历史学家考证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史记》，《史记》中提及“关中”地名40余次。关中的地域现在一般依据的是史念海、李之勤等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的界定：“是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古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官后稷教民稼穡于此，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在此兴衰更替，更是与关中发达的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唐末至宋以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关中农业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有史以来关中地区就素以“八百里秦川”而著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是，如果翻开民国期间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华南地区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西南地区有施坚雅的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华北地区有平野义太郎的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有杜赞奇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等，有影响的研究唯少有西北地区的关中研究。国内学者虽多有涉及，但少有系统深入研究。那是不是关中农村研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关中农村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中农村的典型性与独特性，从历史的视角给予透彻分析的是秦晖先生，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分析指出：第一，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

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① 第二，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传统社会中，关中农村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主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关中农村也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因此对关中农村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意义。

钞晓鸿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他的研究发现针对一般所认为的商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的情况，“不置田地”却在陕商中极为普遍，无论是陕商购置田地的数量还是购置田地的商人人数，均较微少。“有能力兼并土地的富商非但没有兼并土地，甚至连自家原有的土地也懒于经营。”这与关中农村“慎终追远及家族聚居观念并不强烈”有关，“明清关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家谱、祠堂、族田的相对稀少”，“宗族势力本身的相对衰弱便为其他组织与势力在当地社会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关中基层社会治理中，商人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而商人参与地方治理，“宗法共同体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遏制个体的独立性，将每一成员均融到大家共同发展的步伐之中，这又不能不引起商人的反对”，因此关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贺雪峰先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关联，认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很大，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存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依据在农户家庭以上是否存在认同与行动单位及存在什么类型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治类型的不同，“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

^① 秦晖：《来源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治模式与宗族型、家户型和小亲族型等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式”。关中的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个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它可以调解处理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户族一般缺乏对外的功能。

因此，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中农村是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认识价值和指导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关中乡村的典型性具有对与其相似农村地区的推论价值，关中乡村的独特性具有为宏观理论建立地域性个案积累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是在海外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关中农村的学者还是非常少，对关中农村的系统深入研究还非常匮乏。

所幸的是 21 世纪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致力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观测站基金的支持下，他们坚持每年深入关中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关中农民，研究关中农村，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如赵晓峰博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庙会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观点。2014 年，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中心参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时，特别以关学创始人、关中著名学者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勉励中心学者要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研究，先生还特别为中心留言：

关中学派传统深，
横渠四句是经典，
西北农研待继开，
青年才俊勇担当。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本《关中乡村研究》第二辑，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对关中研究的成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们一定会秉持关学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开创关中研究和农村研究的新天地！

付少平

2015 年 9 月

目 录

序一 打造农村社会研究关中学派的抱负应该肯定	郑杭生 (1)
序二 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付少平 (1)
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	
观点综述	郭占锋 李 卓 李 琳 付少平 (1)
基于主观幸福感的农村老年人精神卫生研究	杨学军 鄢 闻 (14)
教育均衡视角下农村教师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及改革对策	
——小规模和大规模学校的对比研究	赵 丹 (29)
接点推广：农业科技进村入户的内在机制与分化困境	
——以关中眉县猕猴桃产业	
发展为例	赵晓峰 陈 辉 张正新 (45)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风险及其超越	何得桂 (58)
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妇女对公婆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关中四个村庄的调查发现	刘利鸽 白志鹏 (70)
村庄水利合作问题的突出表现与对策建议	陈 辉 (84)
农村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	
——陕西户县三村调查	袁君刚 (92)

论“人生任务”

——基于关中邢村生命价值的考察 陈 靖 (102)

庙会：时代转型期农村居民凝聚和身份认同的

重要实现路径 苏燕平 (117)

科技扶贫、非均衡资源配置与贫困固化

——基于对阳县苹果产业科技扶贫的调查 邢成举 (135)

创新的扩散：以大学为依托的农技推广模式的

实现机制 张世勇 卢云龙子 (147)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农村失能老人照护路径探索 王 华 (163)

张载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吴 媚 李 卓 郭占锋 (175)

关中新型农村社区民居设计与研究 赵强社 (187)

数字与标准的艺术：高速公路征迁中的去政治化

策略与政治 刘 娟 叶敬忠 (207)

人口过疏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研究

——基于陕西古村的调查 姚自立 (224)

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郭占锋 李 卓 李 琳 付少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这对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农村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入，是摆在中国农村研究者面前新的时代任务。

为促进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讨论与交流，探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2016年5月21—22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和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杨凌召开。^①会议聚焦了国内农村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

* 此文已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发表，此处略有改动。

** 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付少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① 郭占锋：《发挥社会科学智库作用，名家共议农村社会发展——全国农村社会学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http://news.nwsuaf.edu.cn/xnxw/6485.htm>）。

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一 关于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

（一）文化自觉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的鲁可荣教授认为传统村落一般是指具有比较完整的村落形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俗和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村民仍然生活、生产在村落当中。而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且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秉承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①同时，鲁可荣教授指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价值；二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三是村落社区共同体的生活价值；四是村落文化传承和独特的教化价值。

紧接着，鲁可荣教授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传承古村落的价值。首先，原生态农业生产价值在延续的过程中应该与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其次，传统村落的生活价值应该结合现代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促进村落发展的同时，实现村落共同体价值与乡村旅游的有效对接；再次，传统乡村文化和教化价值的传承应该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根”；最后，要以农民为主体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新乡贤”带动农民的文化自觉。在目前“大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关于乡村复兴的道路，国家层面提出了建立美丽乡村，社会层面则借助媒体的力量和资本下乡的形式在推进，知识分子则通过“新乡村试验”的形式在探索；返乡大学生和乡村精英通过本土创业在努力。但在村落文化保护中也应该发挥村民的积极性，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形成内部发展动力，从而与政府共同努力促进村落生命力的焕发，推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文化自觉，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文化自觉，那么村庄层面的文化自觉就会显得更加困难，甚至无从谈起。

^① 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2页。

（二）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罗兴佐教授基于实地调查和家乡的体验，认为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基础，即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结合。民间信仰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祖先信仰、鬼魂信仰、仪式信仰和马仔信仰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的信仰中，祖先信仰是具象型的，可以通过族谱、祠堂和坟墓等具体的形式直接观察到；鬼魂信仰是抽象型的，主要是一些民间传说、鬼魂故事等虚无缥缈的东西高度抽象而构成的，无法直接观察到；仪式信仰主要通过举行一些盛大的祭祀仪式来表现，并且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马仔信仰则是部分马仔以民间信仰的名义来骗钱，且可以进行代际传承，子承父业。

通过比较不同民间信仰的类型和特点之后，罗兴佐教授指出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混合，许多宗族祭祀和神仙祭祀是合二为一的；民间信仰具有地域整合的功能，家乡的村庙可以覆盖多个杂姓村，异姓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得到化解；民间信仰的发育程度与宗族文化的承继程度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民间信仰传承较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御外来宗教的能力。

（三）激活当代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农村因为长期资源输出和文化转型而成为国家发展中的短板。农村发展需要帮扶，从传统的农村衍生到现代农村的过程中，要想落实顶层设计，必须重新定位和设计，激发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认为激发农村发展共享系统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仅仅在农村，农村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当前村落共享系统缺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劳动力缺失，农村的主体不是农民；二是外来资本进入，但是与传统的村落脱节，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三是传统价值脱落，外来的价值观进入村落，农民的认同感缺失，传统村落共同体式微；四是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国家文化建设下行机制不畅，乡建流于形式；五是涉农资金缺失，国家与村落对接不畅，无良好的村民监督机制；六是村落自治精英匮乏，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活跃，各种人群进入农村，但是村落精英落地和合理运行

距离较大。近代以来，乡村共享传统缺失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的乡村建设运动到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新乡村建设试验”和“新乡贤”等，都在为激活乡村的共享系统和探索乡村的发展出路而不断努力。在当代应该以共享、共治和共存为基本的价值基础，以最低的成本来治理，发挥女性群体、返乡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等人群的作用，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共治，建立畅通的上下互动、上行下达、下行上达机制，培育村落建设与发展的新型主体，激发乡村共享的传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层根源是文化问题，文化自主性被破坏始于100多年前。但是，这个破坏不是说西方在精神价值上优于我们，而是在载体上，西方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优于我们。农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危机，进而威胁到农民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虽然把农村问题归结于文化问题，但是他发现其实源头依然是物的力。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危机则是城市化不断发展引发的，这个仍然是物的原因，着力点不在文化中，应该把其作为目标，应把传统文化与生产发展相结合。而民间信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在宗族性的村庄中，公共仪式保存得比较完整，仪式化生活十分明显。但是，乡村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乡村社会性重建的过程中，如何符合现代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实现民间信仰的重塑，是当代乡村文化建设和公共空间重建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 关于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当代村社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认为，从具象上来讲，村庄共同体主要有三个面向，即生活共同体、集体经济和行政单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可以用“村社”一词来概括，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其谋取村庄利益的一面在不断加强。村社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地域生活共同体，是在村社内部实现一种平等的安排，但这种村社制度仍然值得肯定。集体制下的农民身份可以保留一二百年，是一种弹性的制度安排，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村社制度应该发扬、保留和不断转化。那么，如何研究村社制度呢？仝志辉教授提出，一是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利用统分结合的双重精英体制，村民选择是村社公共意志的体现，村民作为个体，选